

论哈特法哲学理论的语言学方法与反科学主义意蕴

——基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诠释

单 锋^{*}

〔摘 要〕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与哈特的法哲学理论有着众多交会之处,是理解哈特法哲学理论的核心。因此,在考察哈特与维特根斯坦思想脉络关联的基础上,运用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中的“语言游戏”说,从“语境原则”和“语言游戏”多样性的两个方面对哈特法哲学理论关于法律陈述方面的论述进行维特根斯坦式解读,对于理解哈特法哲学理论并进而准确把握其法律的内、外陈述的意义以及理解其法哲学理论背后的反科学主义的哲学意蕴,在日常生活法律语言运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启示。

〔关键词〕 语言游戏;语境规则;法律的内、外在陈述;反科学主义

一、哈特与维特根斯坦:一个思想外史的考察

20 世纪的西方哲学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就是出现了所谓的哲学的“语言转向”,语言成为哲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和概念分析也成为哲学尤其是英美哲学的主要方法,分析哲学在英美哲学界几乎是一统天下,成为哲学的主流。一般认为,分析哲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数理逻辑创立后兴起的运用现代逻辑方法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以澄清语言意义的哲学活动;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在二战后兴起的由对日常语言的关注而引发的对日常语言的使用进行描述和概念分析的潮流;第三个阶段则是在现代逻辑有了新的发展(如出现了模态逻辑、时态逻辑和道义逻辑等非经典逻辑)以及美国实用主义的复兴影响下而出现的哲学研究方法和观点。^①其中,第二个阶段分析哲学的重心几乎完全就在英国,并且主要就是在剑桥和牛津两所著名的大学。在剑桥,主要以后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而在牛津,则是以奥斯汀、赖尔和斯特劳森等人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又称牛津学派。而哈特当时就在牛津大学教授哲学。他敏锐地注意到这股新的哲学潮流,

^{*} 法学博士,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210093。

^① 参见[法]让·热拉尔·罗西:《分析哲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年,第 4 页。

积极主动地融入其中,并成为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①其后,哈特接替古德哈特任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便将这种新的哲学方法引入到法学研究当中,把先前枯燥乏味的英国法理学改造成为一门真正的法哲学,创立了新分析法学。

而哈特真正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的时间正是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产生并逐渐成熟的时期,哈特是否与维特根斯坦本人有过接触,目前并没有相关记载佐证,但在莱西关于哈特的传记中,我们可以钩稽出一些维特根斯坦对哈特影响的证据。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对于整个牛津学派的影响,如莱西在传记中提到,虽然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一书直到1953年才出版,但维特根斯坦的课堂笔记《蓝皮书》和《棕皮书》的复印本在1940年代中期就已经通过非正式渠道流传开来,而牛津学派著名的周六晨会就曾对维特根斯坦的这些后期思想进行过多次讨论。另外,不少牛津学派的成员都对维特根斯坦极为钦佩,如汉普舍尔记得大部分牛津哲学家都承认维特根斯坦是“这门学科中爆发的一个天才”,斯特劳森也对《哲学研究》赞赏不已,并承认当他第一次读到《蓝皮书》时,“我觉得自己第一次看到了思想,尽管它是赤裸裸的”。甚至代表牛津这股日常语言哲学潮流的口号“不问意义,只看用法”也是来自维特根斯坦。其次,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对哈特本人也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如哈特在日记中记载了他阅读《蓝皮书》的感受,认为这本书促使他放弃了对某些知识问题复杂性的极端认识,并让他设法寻找某种更为简单精致的分析。而后来,他甚至说《哲学研究》是“我们的圣经”。

1988年,哈特的忘年交萨默斯到牛津拜访他时发现,暮年的哈特仍沉迷于维特根斯坦且刚刚读完麦吉尼斯的维特根斯坦传并心有戚戚。^②另外,哈特在1970年代出版了两本书《边沁研究文集》和《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这两本书的封面分别是蓝色和棕色,其意图在于响应维特根斯坦的《蓝皮书》和《棕皮书》^③;哈特曾受教于魏斯曼,后者是维也纳学派中除石里克外与维特根斯坦关系最为密切的学者,而哈特的得意门生P. M. S. 哈克则是著名的维特根斯坦研究专家。

然而,虽然我们钩稽出了这些维特根斯坦对哈特影响的证据,但总体来说,关于维特根斯坦对哈特直接影响的材料还是比较单薄,尤其是,哈特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提到维特根斯坦的地方很少。不过,对于本文来说,这并不构成大的问题。英籍匈牙利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提出,思想史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侧重于研究思想发展中那种通过客观观察可以得见的外部关系,主要是影响一位学者思想的人生经历和社会事件等,譬如某某思想家读了某某思想家的著作、某某思想家与某某思想家之间有相互的师承关系,等等,称之为思想外史;一种侧重于研究思想发展中那种不易得见的内部逻辑关系,称之为思想内史。与外史不同,内史不是从外部观察得见的,而是需要研究者根据自己的解释和理解进行理性重构而成的。^④因此,用这种分类方法来说,本文主要想考察的是思想的内史而不是外史,或者用英国哲学家达米特的话来说,是思想的历史而不是思想家的历史。^⑤前述对于哈

①哈特自述道:“战后(指二战后——引者注)我则是在牛津教授了七年哲学。那是浸淫于一种现在被称为‘语言哲学’之进路的七年,也是语言哲学在牛津和剑桥都最有影响的时候。”(参见[英]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支振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3页。)

②以上关于维特根斯坦对牛津学派和哈特的影响,参见[英]妮古拉·莱西:《哈特的一生:噩梦与美梦》,湛洪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169-170页、第438-439页。

③参见[英]妮古拉·莱西:《哈特的一生:噩梦与美梦》,第397页。

④参见[英]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63-167页。

⑤达米特认为,“一种真正的历史研究必须提供一些哲学家对另一些哲学家发生影响的证据。为了确立这种证据,必须仔细查阅出版物的日期,研究日记和私人书信,甚至查阅图书馆目录,以便发现一些特定的哲学家读了些什么或可能会读些什么”,而思想史研究则并非这样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参见[英]达米特:《分析哲学的起源》,王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页)。

特与维特根斯坦之间的思想外史的考察仅仅是为我们进入思想内史提供一个感性的认识,而后者才是我们下面所要讨论的主题所在。本文接下来所要做的,就是从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中最具代表性的“语言游戏”说的视角,对哈特法哲学理论中颇具特色的关于法律陈述(尤其是关于内在陈述和外在陈述的区分)的论说作一番解读,并揭示其中所蕴涵的反科学主义的哲学取向。

二、“语境原则”与法律陈述的语言学方法

“语言游戏”是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核心概念,人们甚至有时就把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径直称为“语言游戏论”,以与作为前期维特根斯坦思想之总结的“语言图像论”相对应。“语言游戏”这个概念最初是在《蓝皮书》中提出来的,意指“孩子刚开始使用语词时的语言方式”、“语言的原始形式”,后来维特根斯坦对这一概念作了进一步的扩展,即“通过逐步增加新的形式,我们可以从诸种原始形式构造起诸种复杂的形式”,这些复杂的形式也可以称为“语言游戏”。到后来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赋予了“语言游戏”更为广泛的意义:“我还将把语言和活动——那些和语言编织成一片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称作‘语言游戏’”(第一部分,7节)。^①可见,“语言游戏”主要地是指语言的使用方式。当然,“语言游戏”这个概念作为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核心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许多主要论题如意义即使用、遵守规则、生活形式等等都是由“语言游戏”所生发出来的。在笔者看来,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这一思想的核心观点主要体现为两

点:一是我们不能孤立地理解一个语词、一个句子,而应当把它们置入它们所赖以存在的语言环境,比如说,我们只有在整个象棋游戏中才能理解什么叫做一个“卒”,一个“兵”,什么叫做“跳马”,什么叫做“将军”,在语言哲学中,这样的一种观点被称为“语境原则”(context principle)。二是在于,它让我们意识到,语言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符号表征用来描述世界的,它还有很多用途,语言的不同用法就形成了不同种类的语言游戏,在语言哲学中,这可以被称之为语言游戏多样性论题(diversity thesis of language game)。我们下面的讨论就将紧紧围绕这“语言游戏”的这两个思想内涵展开。在这一部分,我们主要讨论语境原则在哈特法哲学理论中的运用,而在下面两部分,将重点讨论语言游戏多样性在哈特法哲学理论中的体现及其所蕴含的哲学倾向。

“语言游戏”这一概念意味着我们要理解一个句子,必须将其放在其所在的语言游戏当中。这涉及如何确定意义的基本单位的问题。^②在近代,洛克、休谟、密尔等人大多把词看做意义的基本单位,但边沁已开始把句子看做意义的基本单位。到了现代,弗雷格提出了著名的“语境原则”,主张语词只有在句子中才能确定其意义,这也就意味着意义的基本单位是句子而不是词。^③早期维特根斯坦接受了弗雷格的这一原则,认为“只有命题才有意义;只有在命题的联系关系中名称才有指谓。”^④而到了后期,维特根斯坦更进一步把语言游戏看做意义的基本单位,“在他看来,无论词或语句都没有独立的意义,它们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才能获得意义,词和语句的意义都是在语言游戏中确定的。”^⑤维特根斯坦举例说:

设想一个语言游戏:B根据A的提问

^①参见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4页。

^②“意义的基本单位”这一提法并不十分准确,不过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需要很大的篇幅,并且与本文关系不大,为了避免行文过于散漫,姑且暂就通常用法。对于这一问题的精辟论述,参见陈嘉映:《信号、句子与词》,陈嘉映:《从感觉开始》,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30-42页。

^③参见[德]弗雷格:《算术基础》,王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8页。

^④[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5页。

^⑤涂纪亮:《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向他报告一堆板石或方石的数目,或堆放在某处的石料的颜色和形状。——某个报告可能是“五块板石”。那么,“五块板石”的报告或断言和“五块板石!”的命令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在于说这些话在语言游戏里所扮演的角色。(第一部分,21节)①

也就是说,同样一个表达式,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中就具有不同的意义,在命令的语言游戏当中,“五块板石”意味着“给我拿五块板石来”,而在报告的语言游戏当中,“五块板石”则意味着“这儿有五块板石”。而我们要弄清表达式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首先就必须知道我们正在玩的是什么语言游戏。

哈特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他的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就职论文《法理学中的定义与理论》中,他批评了那种孤立地考察法律语词和法律语句的做法,强调要从整体语境出发来理解法律语词和法律语句。当然,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地说自己的这种观点是来自于边沁:

很久以前,边沁就发表了他的告诫,指出法律语言需要一种独特的阐释方法……他说,我们一定不能把这些词汇拆开了、孤立地去看,而应把它们放回到它们的扮演独特角色的句子中去,从而进行一个整体的考量。我们切勿仅仅去考虑词汇“权利(right)”,而应考虑的是句子“你拥有一项权利”;也切勿仅仅去考虑词汇“国家”而应考虑的是“他是这个国家的一个成员或一名官员”。②

而在该文其后的论述中,哈特对于这一语境原则的运用有明显扩大的趋向,即他不仅认为法律词汇必须放在一个句子中来进行考察,而且还认为包含这些法律词汇的句子也必须在整个法律制度的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他在探讨法人概念的时候引用了梅特兰曾经举过的一

个例子:假设有一个主权国家叫做纳斯夸米亚(Nusquamia),和许多主权国家一样,它也负债累累,你正好也是它的债主之一,它欠你1000英镑。那么,当纳斯夸米亚欠你1000英镑的时候,到底是谁欠你1000英镑?哈特认为这种问法本身就是成问题的,因为唯一的答案就是再次重申:纳斯夸米亚。而这等于什么都没说。正确的方法则是把“纳斯夸米亚欠你1000英镑”这个陈述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并且可能要用如下方式来描述它:

1. 这里,在纳斯夸米亚的版图范围内有一套正在起作用的法律体制;根据这个体制的法律的规定,遵循特定条件的特定人,可以为某种目的而被授权去接受一笔款项,以及为其他行为。这类似于那些按照要求在私人个体之间签订借款合同的人们的行为。

2. 当这些人去为这些行为时,特定的后果就会接踵而至,这些后果与那些由私人间类似行为所具有的后果非常相像。它们包括法律所规定的人从法律所规定的那些资金中偿还所欠款项的责任。

3. “纳斯夸米亚人欠你1000英镑”的表述并不能说明存在这些规则,也不能说明存在这些情况;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当这些规则存在时,这个表述就是正确的,并且会被用于在特殊个案中根据这些规则推出一个法律结论来。③

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法律陈述必须从其所在的法律体制中获得它的意义。而这样一套法律体制也就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语言游戏,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就是由法律语言和法律活动所编织成的一个整体,任何一个法律陈述都只有在这样一种语言游戏中才能够被人们所理解。

①[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②[英]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第29页。

③[英]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第44页。

三、“语言游戏”的多样性 与法律的内、外在陈述的关联

如前所说,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游戏”这个概念是为说明语言活动的多样性,以批评那种试图以一种语言游戏来说明其他语言游戏的简单化、单一化的倾向。从多样中把握统一自古希腊以来就是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哲学探究的一个重要目的。维特根斯坦在其早期哲学思想中也秉持这样一种单一主义的观点,并得出了“语言图像论”的结论,即把语言看做对于现实世界的摹写,语言的功能就在于反映世界、描画现实,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来看,这也就意味着,任何语言活动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种唯一的“语言游戏”。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对于前期维特根斯坦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对这种单一语言游戏观的否定开始的。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语言游戏的多样性。例如:

- 下达命令,以及服从命令——
- 按照一个对象的外观来描述它,或按照它的量度来描述它——
- 根据描述(绘图)构造一个对象——报道一个事件——
- 对这个事件的经过作出推测——
- 提出及检验一种假设——
- 用图表表示一个实验的结果——
- 编故事;读故事——
- 演戏——
- 唱歌——
- 猜谜——
- 编笑话;讲笑话——
- 解一道应用算术题——
- 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 请求、感谢、谩骂、问候、祈祷。(第一

部分,23节)①

在这些例子的结尾,维特根斯坦特意说道:“把多种多样的语言工具及对语言工具的多种多样的用法,把语词和句子的多种多样的种类同逻辑学家们对语言结构所说的比较一下,那是很有意思的(包括《逻辑哲学论》的作者在内)。”②这也就是说,后期维特根斯坦对于包括他(前期)在内的“逻辑学家们”对于语言的简单化认识予以了否定,而这种否定的目的在于揭示人类思维中存在的这样一个问题,即“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我们对语言形式本身的误解,最常见的是把不同的语言游戏混淆起来,或者认为某种语言游戏是唯一合法的。”③

在哈特《法律的概念》一书中,我们也能常常碰到与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游戏多样性的论述极为相似的观点。在本文中,笔者主要从法律陈述的角度来对此作一比较,这也就是哈特非常著名的关于法律的“内在陈述”和“外在陈述”之分。

哈特是从“义务”这一观念出发运用他娴熟的语言分析技巧逐步得出这一著名区分的。哈特认为,说某人被迫去做某事(*be obliged to*……)与说某人有义务做某事(*have an obligation to*……)这两种陈述是不同的。前者通常是关于行为由已作出的确信和动机的心理学陈述,后者则不是。因为前者所说的“确信”和“动机”并不一定是后者作出陈述所必需的,并且,我们说某人“被迫”做某事通常是他实际上已这样做了,而说某人“有义务”做某事与他是否实际上做了并没什么关联。把二者等同将导致以心理学的感情术语误释规则的重要的内在方面。也就是说,法律作为一种语言游戏不同于其他种类的语言游戏,为了强求表达一致而把它与其他语言游戏相混淆不仅会产生理解上的混乱,而且会使我们对法律自身的一些重要特征视而不见。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规则的

①[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19页。

②[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19页。

③涂纪亮:《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研究》,第4页。

“内在方面”。规则的“内在方面”是哈特在分析社会规则与习惯之间的区别的时候所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从外观上看,社会规则与习惯都是观察者能够记录下来的有规律的统一行为,但显而易见,社会规则与习惯是不同的,两者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如果一个社会的规则要存在的话,至少有某些人必须将有关行为看做该群体作为整体应遵循的一般标准”^①,这就是规则的“内在方面”,而习惯的存在则无须这样一个内在方面。正是因为规则有这样的一个“内在方面”,这就产生了一些关于规则的特殊表达,就像维特根斯坦惯常所做的那样,哈特以国际象棋为例对此进行说明:

国际象棋棋手们不仅有以同样方式移动王后的类似的习惯,……而且……他们将此行为方式看做所有参赛者的一个标准。每个棋手不仅本人以一定方式移动王后,而且对所有以那种方式移动王后的行为的适当性“有看法”。这些看法在偏离行为现实存在或出现预兆时,体现为对他人的批评和对他人提出服从要求;在接受别人的批评和要求时,体现为接受这种批评和要求的正当性。为了表达这种批评、要求和承认,一系列“规范性”语言被人们所采用。如“我(你)不应该那样移动王后”,“我(你)必须那样移动”,“那样是对的”,“那样是错的”。^②

而在此类表达上常常发生的错误就在于:规则的内在方面经常被曲解为与外部可见的身体行动相对照的纯粹“感情”问题。哈特对此论述道:

毫无疑问,在规则被社会群体普遍接受,并一般受到社会批评和要求遵守的压力所支持的地方,个人可能经常有类似于受限制或被强制那种心理上的体验。当他们说他们“感到受约束”而以某种方式行为

时,他们可能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些体验。但对于“有约束力的”规则的存在来说,这种感受既不是必需的,也不是充足的。说人们接受某些规则但从未有过受强制的感受,这种说法是不矛盾的。所必需的是,对作为共同行为标准的某些行为模式应存在着审慎的、沉思的态度,而且这种态度本身应表现在批评(包括自我批评)、要求服从以及对这种批评、要求之正当性的承认之中。所有的批评、要求和接受都在“应当”、“必须”、“应该”、“正确的”、“错误的”等规范性语词中发现它们特有的表达。^③

而“义务”观念作为这样一种“特有的表达”,正是从规则的“内在方面”看待自己和他人行为的观念,哈特称这样一种站在“接受规则并以此作为指导的一个群体成员”立场上所具有的观点为“内在观点”,与之相对应的是“仅仅作为一个本人并不接受这些规则的观察者”所具有的观点,即“外在观点”。^④ 而从内在观点出发所作的陈述他就称之为“内在陈述”,从外在观点出发所作的陈述就称之为“外在陈述”。显而易见,“内在陈述”是法律这种“语言游戏”所特有的表达,也是我们理解法律这种社会现象的关键所在。否则,我们将无法区分规则与单纯习惯甚至是偶然的行为一致性,也无法获得规则的观念。

哈特似乎对自己提出的这两种陈述的区分颇为自得,紧接着就运用这一理论在法理学中争论不休的法律的“效力”与“实效”问题上小试牛刀。他认为,只要清楚地认识到内在陈述与外在陈述的区分,那么有关法律“效力”观念的许多模糊不清之处就可迎刃而解。在他看来,与“效力”有关的陈述属于内在陈述,因为“某一个特定规则是有效力的这种陈述意味着它符合承认规则所提供的一切标准。”^⑤而与“实效”有

①[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58页。

②[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59页。

③[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59页。

④[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90页。

⑤[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104页。

关的陈述属于外在陈述,它“意指一个要求某种行为的法律规则多半被遵守的事实”^①。这也就是说,关于“效力”的陈述和关于“实效”的陈述是处于两种不同的语言游戏之中,“效力”和“实效”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更不能把两者相混同或企图用其中的一个来涵盖另一个。而哈特运用内在陈述和外在陈述的理论来区分“效力”和“实效”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批驳法律现实主义的预测论:即断言一个规则的效力就是预言它将由法院或某一其他官方的行为强制实施。他认为,预测论表面上的合理性在于:对旁观者可能记录下来的事实——这一制度一般地是有实效的并可能继续有效——所作的外在陈述的真实性,通常是接受规则并对义务或效力作出内在陈述的任何人的前提。但它却忽视了内在陈述的特殊性,把它作为关于官员行为的外在陈述。这也就混淆了两种不同的语言游戏,从而导致法律理解上的谬误。譬如,很明显的是,当官员在司法判决中作出关于法律规则的效力的陈述时,他显然不是在预言他自己或其他官员的行为,而是表明他作出这个判决的理由。

四、法哲学中的反科学主义意蕴

根据前一部分的分析,法律现实主义的预测论犯了用外在陈述抹杀内在陈述的毛病。那么究竟是什么动机驱使他们这样做的呢?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语言游戏”这个理论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治疗人类思维中单一主义这

种理性疾患。而这种理性疾患自近代至现代以来最突出地表现为一种科学主义的思维模式,即在近现代科学迅猛发展、科学观念深入人心以后,人们往往倾向于用科学的语言尤其是用描述经验事实的那种所谓的“客观中立”的语言来解释一切现象——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从而希望对一切现象都做出所谓的“客观的”因而也是“科学的”说明。这也就导致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出现了一股十分强大的科学主义倾向,希望将自然科学中的成功也搬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来,从而使人文社会科学也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客观。法学领域自不例外。实证法学可以说是这种法学科学化的典型代表。边沁、奥斯丁区分立法学与法理学,其目的就是为了把法律作为一个客观对象来进行研究,他们开创的分析法学因而也被他们视为一种关于法律的科学。甚至法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哲学中脱离出来也正是始自奥斯丁。^② 凯尔森也明确声称自己的纯粹法学是一门法律科学而非法律政治学,他的法学之所以是纯粹的就是因为他要把法律科学从其他不相干的因素(诸如心理学的、社会学的、伦理学的以及政治学的因素)中解放出来,他并且认为这是他的理论的方法论基础。^③ 他们的这种科学倾向就在他们具体的法学概念和法学观点中体现出来了。无论是奥斯丁的(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说”还是凯尔森把真正的法律仅仅看成是“下达给官员的实施制裁的有条件的命令”^④,都是一种用描述经验事实的术语来阐释法律现象的企图。对于这一企图,哈特一针见血地评

^①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104页。

^② “至少在英美学界,真正对法理学科的独立产生影响的,是1832年约翰·奥斯丁的《法理学范围之限定》(*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一书的出版。奥斯丁在著作中强调:法理学只应研究‘事实上是什么样的法律’(即‘实在法’),而不是‘应当是什么样的法律’(即理想法或‘正义法’),力图将道德、功利、伦理和正义的模糊观念排除于法理学的领域以外,创立一个逻辑自足的法律概念体系。基于此点,后世许多法学家称奥斯丁为‘分析法理学之父’。也有人干脆把英美法理学称为‘奥斯丁法理学’。应当承认,正是奥斯丁著作的影响及其追随者们——如阿莫斯(Amos)、马克伯(Marky)、霍兰德(Holland)、萨尔蒙德(Salmond)等人的努力和贡献,法理学最终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理论知识体系、学问和大学的法学课程)而存在。”(舒国滢:《法理学学科的缘起和在当代所面临的问题》,《法学》1998年第10期。)对于奥斯丁关于建立科学法理学的具体论述,请参见[英]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而在这方面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可参见诺洪果:《从命令论到规则观:哈特与奥斯丁之间的学术公案》,法律思想网 <http://law-thinker.com/show.asp?id=3599>,最后访问日期2007年4月28日。

^③ 参见 Hans Kelsen: *Pure Theory of Law*, translated by Max Kni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 1.

^④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37页。

论道：

认为法律就是命令这一著名的理论只是一个更为宽泛也更富野心的主张的一部分。奥斯丁说命令是“理解法理学科学与道德规范的关键，”当代一些以“强制性”或“规定性”的术语去阐述道德评判的努力，就是这种极富野心的主张的遥远回响。^①

然而，岂止是实证法学有这样的“野心”，社会学法学——包括通常被归于其中的法律现实主义——同样也具有这样的“野心”，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毕克斯有颇为精到的论述：

要将法律研究立足于“科学的”——客观的，不含偏见而纯粹的——基础之上的努力，促使许多早期的法律实证主义者，尝试去创建一种理解法律行为与法律概念的严格的经验主义方法，由此将其理解为过去的、当前的以及将来种种因素的应变量。法律理论中的这类探讨，可以在那些要为社会科学研究探索一种“科学”方法的更为广博的研究中见到，这些方法当能与“硬科学”（例如物理学与化学）所运用的方法相提并论，由此，理论就将只以对事件的“客观”观察作为基础，这些事件则可以轻易复制或者得到其他理论家的确认（用稍稍技术一点的话说，就是法律的“规范性内涵”被化约成了“经验性内容”）。因此，法律规则也就根据公民过去遵守法律的倾向、立法者对于特定种类语言的运用、将来施加制裁的可能性、对法官将会如何判案所作的预期等等因素来进行分析了。^②

可见，以“预测论”为代表的法律现实主义，正是——相比实证法学——“研究探索一种‘科

学’方法的更为广博的研究”。从预测论的表述我们就能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说法律实际上就意味着当某人违反一个规则时，我们可以预期法院会做出何种处理。这种说法和我们平常说“天空乌云密布，估计快下雨了”并无二致，因为我们只是对经验事实有所陈说，这也正是外部陈述的特征所在。而导致采纳这种言说方式的，正是那种科学主义的理论倾向和思维模式，用哈特对阿尔夫·罗斯的评论来说就是：在法律现实主义者看来，“能够表征法律并且使之适合现代理性法律科学的特征的唯一适宜的方法，就是一个具有经验科学之诸种陈述的结构与逻辑的方法。”^③

然而，科学的话语就是唯一合法的话语吗？哈特的回答是否定的。不过，首先要说一下的是，对于这种科学化智性努力，哈特并不是全部否定的，他认为无论是法律实证主义者的命令说还是法律现实主义者的预测论，都是出于一种避免法学中的形而上学倾向的动机。^④对此，哈特是肯定的。但是，一种倾向往往掩盖了另一种倾向，为了反对形而上学却形成了科学话语的霸权，这是哈特所不愿看到的。他认为，用描述经验事实的或说科学的话语来解释法律现象并不是反对形而上学的唯一替代方案。而且更为重要的在于，他认为在法学这样的社会科学中，单单经验科学的方法是不够的，因为它甚至连规则和单纯习惯之间起码的区别都无法加以解释，更加无法解释“权利”、“义务”这些规范概念。毕克斯的话形象极了：“一个人用眼睛或用试验设备的检验并不能看到义务和权利。”^⑤而要解释这样一些概念和现象，哈特认为

①[英]哈特：《实证主义及法律与道德的分离》，[英]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第65页。

②Brian Bix：《H. L. A. 哈特与法律实证主义》，周林刚译，法律思想网 <http://law-thinker.com/show.asp?id=2767>，最后访问日期2007年4月24日。

③[英]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第14页。

④如在对奥斯丁将“义务”的观念界定为“负有义务的人如若违反就会受到惩罚的可能性”这一观点进行评价时，哈特就说：“这种解释实际上把义务陈述不是作为心理学的陈述、而是作为遭受惩罚或‘灾祸’之或然性或可能性来解说这一观念。在许多后来的理论家看来，这种做法显现为一种启示，它给人间带来一个困惑的观念，又以与科学中使用的术语同样明晰、确定和经验的术语重述这一概念。的确，它有时被人们认作是形而上学的义务或责任概念的唯一选择——形而上学把义务或责任看作神秘地存在于普遍的、可观察的事实世界‘之上’或‘背后’视触不见的东西。”（[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85-86页。）

⑤Brian Bix：《哈特和法律理论中的诠释学转向》，湛洪果译，法律思想网 <http://law-thinker.com/show.asp?id=359>，最后访问日期2007年4月24日。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诠释学”的方法,“它包括对规则之治的行为的描述,正如此种行为向其参与者所呈现的那样。”^①这样一种参与者的视角,正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内在观点,而法律实践中的大量陈述,正是在这样一种观点下所作出的内在陈述,其中包括了关于“立法”、“司法”、“有效性”、“权力”、“权利”、“义务”等等这些构成我们法律制度之核心的概念的法律陈述。哈特认为,有一股持续不断的动力推动着人们用日常的或“科学的”,陈述事实的或预测的话语来分析这些概念,但是,这仅仅只能复制外在方面。^② 如果我们仅仅考察那些用经验事实性的话语表达出来的外在陈述,那么很显然,我们将会失去理解法律实践最重要的方面。笔者认为,哈特这里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深刻的问题: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法学需要怎样的一种与其相适应的研究方法?抑或是,存在多种

互相竞争、互相补充的方法?当然,这已经是另一个更为宏大的问题,非本文所能承担。最后,且让我们引一段哈特再传弟子比克斯的评论作为结尾,同时也作为我们进一步思考的出发点:

哈特批评了奥斯丁将法律还原为表示倾向和预测的经验词项的努力……因为若仅仅表明法律的外部可观察部分,这将错失法律实践的一个基本部分:官员和公民把那些法律规范作为行动的理由接受下来。……那些接受了法律的人的态度无法轻而易举地被一个具有更多经验性和科学性的进路所把握,而将法律实践的这一方面纳入考虑所具有的好处促使哈特采取了一种更为“诠释学的”进路。^③

(责任编辑:杨嵘均)

Language Game, Context Principle and Anti-Scientism: A Wittgensteinian Reading of Hart's Legal Philosophy

SHAN Feng

Abstract: Hart's legal philosophy has many contacts with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of later Wittgenstein. This is a ke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Hart's legal theory. Therefore,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Hart's thought and Wittgenstein's, the author makes a Wittgensteinian reading of Hart's legal theory from two aspects of Wittgenstein's thought on "language game", i. e., "context principle" and the diversity of language game. This reading will facilitate the understanding of Hart's legal theory, especially his thought 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atements in law and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of anti-scientism of Hart's legal theory, which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in the operation of legal language in ordinary life.

Key words: language game; context principl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atements in law; anti-scientism

①[英]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第14页。

②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99页。

③B. Bix, "Legal Positivism", in Martin P. Golding & William A. Edmundson (eds.), *The Blackwell Guide to the Philosophy of Law and Leg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 p. 33.